

國立政治大學《史薈》第 58 期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2025)七月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新知識份子眼裡的 日本：以《新青年》與《每週評論》 為例

歷史四 林宥瓊

摘要

本文以 1917 至 1920 年的《新青年》與《每週評論》為主要材料，以群體的視角，觀察「新派」知識份子的世界觀，乃至他們理解的中日關係。

1918 年至 1919 年，中日兩國都受到歐戰後的世界秩序影響，因此有必要先了解歐戰下知識份子的世界觀。首先，歐戰期間知識份子已有帝國主義——人道主義對抗的觀點，也注意到世界共同體的觀念，協約國的勝利與威爾遜十四點原則，讓他們確立人民與軍閥政府的善惡二分。接著，藉由吉野作造與李大釗開始的中日交流與周作人介紹武者小路實篤的回響，可以發現他們對日本人民抱持友善態度，即便發生五四運動，也仍然保持希望。最後認為《新青年》與《每週評論》呈現的對日觀，是新文化運動的一環，他們對

人民要求覺悟，深信民主能帶來中日兩國的和平。

關鍵字：中日關係、歐戰、五四運動、新青年、每週評論

一、前言

歐戰結束的世界，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當道，美國總統威爾遜主張的民族自決和似乎出現的新世界秩序為國際地位低下的中國帶來了希望，在此國際背景下，知識份子一方面繼續主張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一方面對即將來臨的巴黎和會感到樂觀。¹然而事情發展非如人們最初所想，巴黎和會期間，北京政府配合外交代表團進行國內輿論宣傳，但輿論很快反過來想約束政府，出現賣國賊的說法。而威爾遜在權衡國際聯盟與民族自決後，決定在山東問題上向日本讓步，使北京政府聯美制日策略出現變數，中國國內輿論以全有全無的簽約主張，將不滿指向了政府，五四運動由此爆發。²

五四運動雖作為維護國權而引發，但它的另一面是個體主義的新文化運動，國際上國家是一個體，國內以個人為個體，新文化運動針對個人思想的改革，在五四運動呈現的是明顯的國族主義內涵。³可以說，在新文化運動中作為隱含動力的「救亡圖存」民族情感，在五四運動時徹底表現出來。

歐戰與五四運動是知識份子接觸國際的兩大事件。那麼，新文化運動裡積極引薦西方思想的「新派」知識份子，如何看待歐戰結束後的世界秩序，乃至與中國利益息息相關的日本呢？其中呈現的世界觀，特別是與五四運動裡外國中的主角日本，又有什麼關係？這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這群新知識份子以他們在《新青年》上的主張受到矚目，他們強調破除傳統，傳播新知，而此新知識，以西方個人主義為底色，單位是「國民」，

¹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臺北：東華書局，1977），頁 257-259。

² 應俊豪，〈公眾輿論與北洋外交—以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為中心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117-120、137-142。

³ 黃玉順，〈「國權」與「人權」之紐結——「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辨正〉，《鵝湖月刊》，536（新北，2020），頁 9-10。

使之擁有新的生活與思想。⁴1915年《新青年》創刊正逢歐戰期間，對於陷入戰火的西方文明，創刊者陳獨秀並未感到悲觀，反而抱持的是進步觀——認為反傳統是使中國脫離危機的途徑，引入西方文明將能改善造成中國衰敗的內在本質。⁵

研究材料上，本文選擇以《新青年》、《每週評論》為主，因兩者供稿人部分重疊。《新青年》於1915年由陳獨秀於上海創刊，形式為月刊，宗旨是將各種西方思想引入中國，著重文化層面的啟蒙，1917年遷至北京，1922年後轉以馬克思主義為內容；《每週評論》由陳獨秀、李大釗在1918年底於北京創刊，以週報的形式報導國內外大事與相關評論，於1919年8月遭查禁。⁶1918年至1920年，《新青年》第四卷至第七卷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周樹人輪流編輯，此外，周作人與蔡元培也為之供稿，共同致力於推廣各種思想改革，而陳獨秀、李大釗創刊的《每週評論》，主要用於評論時事。⁷雖然是以兩份期刊所代表的新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觀點作為考察對象，但依舊存在個體的不同傾向，本文使用的史料數量由多至少依序出自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高一涵、蔡元培等。新文化運動要角之一的胡適，在本文關注的時間內傾向不談政治，要到1922年創辦《努力週報》時，胡適才開始有眾多政治評論。⁸

⁴ 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收於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輯：五四運動》（臺北，1990），頁481-482。

⁵ 丘為君，〈「歐戰」與中國的現代性〉，《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6:1（臺北，2008），頁98-103。

⁶ 張玉法，〈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與言論，1915-192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臺北，1994），頁289-290。

⁷ 張玉法，〈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與言論，1915-1923〉，頁289、295-297；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頁483-484、488。

⁸ 張忠棟，〈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臺北，1985），頁291-292。

石曉軍研究中日兩國互相認識的變遷，認為近代以前中國人對日本相當漠視，明代因倭寇而起的第一次熱潮是例外且迅速冷卻，第二次日本熱則是甲午戰爭後，這時期出現大批留日學生，目的是透過日本學習西方，不是了解日本，對日本本身並無太大興趣。⁹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即是在甲午戰爭的日本熱背景下在日本留學過一段時間，歐戰後他們的對日觀為何，亦是在本文探究的範圍。

以下，首先就《新青年》中對歐戰的看法了解供稿的知識份子眼中的世界秩序，再以五四運動為時間分段，觀察事件發生前後《新青年》、《每週評論》對日人的相關評價，其中以吉野作造與李大釗開始的黎明會交流，以及同時間周作人翻譯、介紹武者小路實篤相關思想的知識傳播與回響為主題，認識這些新知識份子的重要刊物上，呈現的中日關係。

⁹ 石曉軍，《中日兩國互相認識的變遷》（臺北：臺灣商務，1992），頁 178-179、208-211。

二、歐戰、世界與中國

歐戰進行時，蔡元培曾經前往歐洲，歸國後《新青年》刊載了他在政學會歡迎會的演說，內容說明他對歐戰的看法，他認為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對抗，結果若不是日耳曼民族以帝國主義支配全世界，不然就是法國以人道主義消滅軍國主義使世界永久和平，戰前主張軍備減少的和平主張就是出自人道主義。¹⁰李大釗則將歐戰、俄國的二月革命視作民主主義與軍國主義的對抗，認為民主已是世界大勢，由此可知他認為民主與軍國主義的對立同樣適用於一國之中，對於作為民主的一方卻興兵的英法，以及俄國二月革命，他是這樣解釋的：

由外表觀之，似英、法等國，為抗軍國主義對於民主主義殘虐之勢，而有漸趨於非民主之趨向，殊不知此特皮相，而察其實質，則民主主義之潮流，仍有滔天之氣勢……民主主義之特徵，乃在國家與人民之意思為充分之疏通。英自開戰伊始，即先留意於各殖民地之意思，而以決定宣戰與否者也。……法國之民，其重質而不重量也。其愛國心為優美思想之所凝化……不獨表現於愛國心之民主主義浸淫於美育之中，即軍隊之感情，亦皆為優美之思想所涵濡。……俄國當交戰之初，一般官僚則以開戰而謀擊破勃興之民主主義……厥後官僚派悟與德戰之非計，乃漸以壓迫手段應付民黨，而此大革命之風雲遂以激起…。此又民主主義有盛無衰之一證也。¹¹

隨著歐戰進展，人道－民主主義出現新的內涵。高一涵在〈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中表示感嘆國人對於歐洲十八世紀天賦人權等學說猶嘖嘖稱

¹⁰ 蔡元培，〈蔡子民先生之歐戰觀〉，《新青年》，卷2號5(北京，1917年1月)，頁6。

¹¹ 守常(李大釗)，〈大戰中之民主主義〉，《甲寅》日刊，1917年4月16日。收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98-101。

奇，不知世界最近趨勢，介紹了近世西方國家的觀念變遷，進一步說明與帝國主義對立的人道主義，其因歐戰產生的變化，是超越國家界線的世界一體：

近世乃知人民之權利自繇，由法律所賦予，國家權力強固一分，即人民權利強固一分。……國家亦非人生之歸宿，不過為人類憑藉，以求歸宿之所在耳。又因列強競爭，日形激烈；人民自繇，僅為此小國家主義所限制，勞勞備戰，……自繇範圍，終嫌狹隘。於是信賴民族競爭之小國家主義者又一變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國家主義。歐戰告終，國際間必發生一種類似世界國家之組織，以衝破民族國家主義之範圍。

高一涵最後將眼光放回中國，表示中國的政治現況與世界思想趨勢一致，但是受到世界思想變遷影響極小，這是因為舊思想尚未破壞前，沒有新思想發展的空間，而應打倒的舊思想以軍閥為代表：

袁氏之自私的國家主義，已經打消。段氏之負氣的武力政策，亦瞬見失敗。……凡憑國為崇，圖謀一部份樂利及假賢人政治為名，以屏斥人民於政治範〔圍〕而外者，皆與此國家主義樂利主義民治主義之新思想，不能並存。¹²

但是中國若要加入歐戰，必須以軍閥主持的政府為單位，認為參戰對國家有利的陳獨秀，又是如何看待主張參加歐戰的段祺瑞政府？首先，他認為參戰是國家存亡問題，因為帶來的益處是：（一）對於本就存在白人的種族歧視，若不戰會被視為懦夫，必須參戰向世界表達「服公理不服強權」的精神；（二）戰爭可以帶來社會進步；（三）國家財政困難，加入協約國，可

¹²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新青年》，卷4號1（北京，1918年1月），頁1-4。自繇，即自由。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以獲得財政援助；（四）中國南北戰爭是黨爭，更大的目標即對外戰爭可使雙方議和；所以對於認為參戰是政界陰謀者，陳獨秀提出辯駁：加入協約國與復辟無關、參戰猶引起反對則如何鞏固段氏地位。¹³可見陳獨秀認為要爭取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利害權衡後，必須接受在國內層次反對的軍閥政府。

歐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於 1918 年 1 月 8 日發表十四點原則，在美國駐華機構宣傳下，中國知識份子對威爾遜主義充滿嚮往，視為新世界秩序象徵，認為中國的租借地等一切領土不完整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並在此風潮下表示對歐戰的看法。¹⁴從《新青年》刊載的「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可以發現對於軍事政治的敵視，而關於公理——強權；民主——帝國的對立說法，仍然用於解釋歐戰。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說道：「戰勝的究竟是那一個？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是為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祝。」¹⁵蔡元培在〈勞工神聖！〉則有黑暗與光明的比喻：「此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¹⁶陶履恭在〈歐戰以後的政治〉認為有四種觀念被歐戰粉碎，它們在國內帶來紛亂，在國外引起世界紛爭，即秘密外交、背棄（國際）法律、軍人干政與獨裁政治，是歐戰帶來的政治上教訓。¹⁷

然而這種對於中國前景的樂觀並未維持太久，1919 年 1 月 27 日與 28 日，

¹³ 陳獨秀，〈對德外交〉，副標國家存亡問題、國民發揮愛國心及能力品格之唯一機會，《新青年》，卷 3 號 1，1917 年 3 月 1 日，收於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300-303。

¹⁴ 應俊豪，〈公眾輿論與北洋外交——以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為中心的研究〉，頁 23、29-31。

¹⁵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新青年》，卷 5 號 5（北京，1918 年 11 月），頁 436。

¹⁶ 蔡元培，〈勞工神聖！〉，《新青年》，卷 5 號 5（北京，1918 年 11 月），頁 438-439。

¹⁷ 陶履恭，〈歐戰以後的政治〉，《新青年》，卷 5 號 5（北京，1918 年 11 月），頁 439-441。

巴黎召開十人會，開始討論山東問題，與會國都傾向分配協約國占領的德國殖民地，使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與領土完整原則趨於弱勢，消息傳回中國，最早於1月31日刊登消息的《晨報》內容混淆，既表示顧王兩人為中國權益辯論，又言中國代表無辯論只能聽候列強裁決。¹⁸日後相同說法出現在其他報導，如《時事新報》京訊之歐和大會消息欄〈青島問題已提出〉，《民國日報》〈青島問題已提出和會〉，皆言中國代表只能緘默等待領土處分。¹⁹同一段時間，陳獨秀對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主張變得悲觀，他維持歐戰進行時即有的公理與強權對抗說，於2月9日《每週評論》隨感錄，認為威爾遜主義失敗的背後，是協約國戴著公理的假面，實際上還是強國秘密包辦，「弱小國的權利問題，縮小軍備問題，民族自決問題，更是影兒也沒有」。²⁰並對威爾遜下了評語：「有一班人因為孫中山好發理想的大議論，送他一個諱名，叫做孫大炮。威爾遜總統的平和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²¹

1918年5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發表了〈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一個青年的夢》是武者小路實篤在歐戰還在進行期間創作的作品。周作人認為，從來稱為好戰的日本，漸漸傾向人道主義，而武者小路是其中非戰論的代表，他的著作是要人民感受和平的重要，並引述武者小路的自序：

我不專做這樣的著作；但也想一面漸漸的動手來做。對於人類運命的憂慮，這不是僭越的憂慮，是人人都應該憂慮的事。我望從這憂慮生

¹⁸ 應俊豪，〈公眾輿論與北洋外交——以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為中心的研究〉，頁88-90。

¹⁹ 〈青島問題已提出〉，《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2月5日，2版。〈青島問題已提出和會〉，《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2月4日，1版。

²⁰ 隻眼（陳獨秀），〈揭開假面〉，《每週評論》，第8號，1919年2月9日，收於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36。

²¹ 隻眼（陳獨秀），〈威大炮〉，《每週評論》，第8號，1919年2月9日，收於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頁37。

出新世界的秩序來。……但我覺得現在的事情，不像在正路上走，能得平和解決的樣子。所以我比別人加倍的害怕。²²

周作人之所以把對戰爭感到憂心的作品介紹到中國，除了呼應武者小路實篤對和平的冀求，也可以從他對人性的關注來理解。《新青年》群體共同宣揚人道主義，惟各有不同偏重，周作人注意的是個人層面，呼籲個人「有意識」地破除奴性，以發現人性，而觀察俄國大革命後的陳獨秀，將人道主義投注在國際事件，認為歐戰是侵略與和平、君主與民主的對抗，李大釗則更進一步將人道主義擴展到世界的層次；三人的共同點是將人道主義視作普世的，不以民族為界線。²³陳獨秀的想法，已可從上述蔡元培與高一涵身上看見類似的架構，以下，我們可以看到李大釗將想法付諸實行，以及周作人關注的個人覺醒，在注意集體層次的陳獨秀、李大釗身上依然存在，他們希望人民意識到以強權壓抑人民權利的軍閥政府，並呼籲人們起而反對軍閥政府，且所謂「人民」不單指中國人，還包含日本人。

²² 周作人，〈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新青年》，卷 4 號 5(北京，1918 年 5 月)，頁 425-429。

²³ 丘為君，〈「新文化運動」時期（1915-1925）的人道主義〉，《師大學報》，66:1(臺北，2021)，頁 29-31。

三、五四前後的中國與日本

（一）1919年5月4日前

1918年底，《每週評論》創刊，發刊詞表示其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而公理就是威爾遜總統的「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平等自由」以及「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²⁴在此之下，陳獨秀於〈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裡認為中日兩國的軍閥是中日關係的威脅：

對內的覺悟和要求，是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現時的東洋各國的當局，像中國的徐總統，像日本的原內閣，都從文人出身，總算是東洋和平的一線光明，也就是東洋各國國民真正親善的種子。此時要提防的，正是他們軍閥在那裡秘密親善，來幹些鬼鬼祟祟的勾當。只要有一方面軍閥出頭推翻那文治主義的當局，那時的國民親善，東洋的和平，便成畫餅了。²⁵

在中國，民主主義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上，加上了威爾遜主義的熱潮，成為看待中日關係的視角。而此時的日本正值大正民主時代。日本學界將1905年民眾挑戰藩閥政府的「日比谷燒打事件」作為大正民主的起點，直至1925年日本實施普選產生政黨內閣為止，松尾尊兌將大正民主分為三階段，本文討論的1917年至1920年，涉及的是大正民主的第二階段至第三階段，即1914-1918、1919-1925，1918年日本發生「米騷動」，寺內正毅倒閣，組

²⁴ 隻眼（陳獨秀），〈《每週評論》發刊詞〉，《每週評論》，第1號，1918年12月22日，收於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卷，頁453。

²⁵ 隻眼（陳獨秀），〈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每週評論》，第2號，1918年12月29日，收於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卷，頁456-457。

閣的原敬成為第一位平民首相，而知識份子受歐戰結束的思潮影響，以行動實踐理念，其中以吉野作造等人為代表人物，1920 年後，原本為主流的民本自由思想消頹，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興起。²⁶

受到威爾遜主義的影響，吉野作造除了在日本國內推廣民本主義，對外聯繫了與之有師生緣分的李大釗，想推廣中日兩國民間交流，實現無國界的國際正義，以國內民主平等為基礎，也追求國與國之間民主平等，世界共榮。²⁷1919 年 1 月 19 日，《每週評論》刊載了吉野作造的通訊，吉野於通訊內容中感謝獲贈《每週評論》，並介紹了黎明會，說黎明會是「純粹學者的結合」，以促進文化為前提，助進開明思想的發達。²⁸

李大釗在 2 月 16 日於《每週評論》發表了向黎明會的祝詞，提到中日兩國的關係，精神和 1918 年 12 月 29 日陳獨秀的〈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是相同的：

我們中日兩國，本來有最親切的關係。我們要想在世界人類中有點貢獻，自然先要把東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氣。……但是這種共同生活的關係，因為有一部份軍閥的強權，在中間妨阻……將來兩國軍閥的親善，卻愈引起兩國民眾的猜嫌。現在平和會議正在開議，我們東洋民族有許多對於世界文化進步的責任，……要知我們東亞的黑暗與光明，都是我們東亞人人共同享受的。²⁹

黎明會的主張被視為日本國內的新思潮而被陸續介紹到中國，除了《每

²⁶ 陳翠蓮，〈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師大臺灣史學報》，6(臺北，2013.12)，頁 56-61。

²⁷ 黃自進，〈吉野作造在五四時期的對華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 上（臺北，1993），頁 511、513-514。

²⁸ 吉野博士，〈黎明會〉，《每週評論》（北京），1919 年 1 月 19 日，4 版。

²⁹ 明明（李大釗），〈祝黎明會〉，《每週評論》，第 9 號，1919 年 2 月 16 日。收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300-301。

週評論》，不少報刊也注意到了黎明會，如《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撰者將黎明會的吉野作造、福田德三兩人與上杉慎吉對立，介紹黎明會的由來：

吉野福田二博士自客歲以來，在新聞雜誌上極力鼓吹民主思想，頑固者流咸目為危險人物，……學者方面則有法學博士上杉慎吉唱國家即最高道德之說，以排斥民主思想……所謂皇國青年會者乃特開辯論會，要求吉野出席答辯……。吉野本其夙昔主張，侃侃而談，唯聲明對於國體問題，並無異心而已，皇國青年會無可駁詰而止，吉野既博此勝利，於是於客臘二十六日糾合同調者組織黎明會……

但是對黎明會名字的意義，撰者不認同福田的說法：

據福田博士之解釋謂黎明二字並非指以前日本之文明，悉在黑暗時代而言，實以日本文明雖不在歐美下，而今日當更發揚光大之，以為世界文明之嚮導云云。此語似嫌太誇，又近於掩飾，試問日本古代文明有一非移植自中國者乎，現代文明又有一非翻譯自歐美者乎，以吾觀之，其用意似指以前之日本為軍國主義跋扈時代，今後之日本為民主主義勃興時代……³⁰

該文撰者注意到的福田德三日本本位想法，是日後新知識份子們，乃至輿論對黎明會感到失望的潛在因素。不過，福田德三的日本本位想法還未引起廣泛的注意。為黎明會牽線的李大釗此時關注的是「東洋民族」，他在1919年3月16日於《每週評論》寫了〈小國主義〉，說日本黎明會有人提倡小國主義，認為大國主義使國內人民反感，國外引起人民仇視，表示反對大國主義。³¹他的想法可從他於2月1日《國民》雜誌發表的〈大亞細亞主義與

³⁰ 〈日本思想界之新潮流〉，《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2月5日，3版。

³¹ 明明（李大釗），〈小國主義〉，《每週評論》，第13號，1919年3月16日，收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3卷，頁323。

新亞細亞主義〉來理解，他表示反對作為大日本主義變名的大亞細亞主義，那是侵略的、帝國的、軍國的，不是亞細亞民主主義，「亞洲境內弱國、小國，那個甘心？」就算是對抗歐美種族歧視，大可先等待巴黎和會，再不濟也應該是亞細亞人一起解決，依世界大勢，該提倡新亞細亞主義，被吞併者行民族自決，再與歐美聯合組成世界聯邦。³²李大釗對大亞細亞主義的警戒，其實自歐戰結束前即已存在，並一貫地強調大亞細亞主義除了違反世界大勢，更無法解決歐美的種族歧視問題，同時訴求日本必須平等看待中國，在 1917 年，他在〈大亞細亞主義〉一文是這麼說的：

日本東京發刊之四月號《中央公論》……題曰《何謂大亞細亞主義》。文中所論，雖在今日實為世界大同進運之梗，吾殊引為憾。……日本國民而果有建立大亞細亞主義之理想之覺悟，首當承認吾中華為亞洲大局之柱石，倘或有外來之勢力橫加凌制，不惟不可助虐，且宜念同洲同種之誼以相扶持相援助……保障世界確實之和平。若乃假大亞細亞主義之旗幟，以顏飾其帝國主義，……其結果必招白人之忌，終以嫁禍於全亞之同胞。……此外，吾人所希望於歐美諸邦者，則冀其速怯狹隘種族之見，而擴充其世界人道之內容……³³

1919 年 3 月，周作人介紹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認為新村的理想是建立新的社會基礎，免去衝突，生物的生存競爭在人類生活中並不必要。³⁴周作人在《新青年》群體裡是特殊的，雖加入以救亡圖存為目標的《新青年》，他在個人主義的光譜上更偏向「小我」。³⁵和陳獨秀相比，他對於生

³² 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國民》，卷 1 號 2，1919 年 2 月 1 日，收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 3 卷，頁 269-271。

³³ 守常（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甲寅》日刊，1917 年 4 月 18 日，收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 2 卷，頁 106-108。

³⁴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卷 6 號 3（北京，1919 年 3 月），頁 266-268、274。

³⁵ 陳俊啟，〈周作人的文學思想（1902-1923）——兼論其與五四新文學運動之關係〉，《成大中文學報》，67（臺南，2019），頁 174-175。

存競爭的看法較不正面。不過他介紹到中國的武者小路實篤，作為日本人，在日後的《新青年》群體裡成為被注意的對象。

（二）1919年5月4日後

巴黎和會進行之中，五四運動發生，民間反日浪潮湧現。因山東問題涉及中日兩國利益，李大釗與吉野作造原本樂觀看待的中日民間親善，其內部隱含的問題也漸漸浮現。五四運動對輿論影響頗大，高一涵在《新青年》如此描述：「現在青島問題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所在，全國的眼光都死死的注在不簽字一個問題上……」。³⁶

相對於收緊管制學生活動的北京政府，陳獨秀支持學生，並不諱言反日。早在5月4日以前，他就認為日本比列強糟糕，在〈公同管理〉一文中他表示：

無論鐵路問題，青島問題……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讓列強公同管理。我們最反對的，是日本管理。……老實不客氣，我們中國若免不得亡國的運命，寧可亡在歐美列強手裡，不願亡在日本手裡。聯合亞洲的黃人，抵抗歐美白人的鬼話，我們絕對不相信。因為黃人待黃人，比白人待黃人還要殘狠十倍。³⁷

因為「近日本校全體學生又以愛國熱誠激而為騷擾之舉動約束無方」，在幫助被捕學生保釋後，蔡元培於5月8日宣布辭北京大學校長一職。³⁸陳獨

³⁶ 涵廬（高一涵），〈關於膠州和約的修正意見〉，《每週評論》（北京），1919年6月1日，2版。

³⁷ 隻眼（陳獨秀），〈公同管理〉，《每週評論》，第20號，1919年5月4日，收於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頁90。該文於1919年5月4日《每週評論》刊登，應早於該日寫成。

³⁸ 〈蔡元培辭職之原呈〉，《神州日報》（上海），1919年5月19日，3版。蔡元培署名後方寫有日期，為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八日。

秀對此道：「禁止國民集會，拿辦愛國學生，逼走大學校長，總算對得起日本人了！聽說親日的軍閥派還要解散大學封禁報館哩！」³⁹在〈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裡，他認為以威爾遜主義進行的和會已是不可能，但還是認為問題在軍閥上，除了列強仍守秘密外交，更是中國政府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密約等束縛所致，所以：「我國民眼見這種失敗，自然應該憤恨，自然應該責備日本，……中、日兩國的軍閥，不都是公理的仇敵嗎？兩國的平民若不用強力將他們打倒……你把他們怎樣？所以我們……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擁護公理。」⁴⁰可見陳獨秀的反日是反對日本軍閥，不包含日本人民。

此時對黎明會的印象還是正向的，一篇文章將 1918 年受黎明會影響而成立的新人會，與五四運動中的北京學生比擬：

大家在恨日本人到了極點的時候，我卻要告訴諸君一樁很可以安慰的事情。……這一次中國的「國民自決運動」，豈不是由北京大學的教授培養出來的麼？豈不是由北京大學的學生奮鬥出來的麼？日本的解放運動，正和中國一樣。大學教授所發起的黎明會，就是培養解放運動的花匠。東京大學的學生所發起的新人會，就是解放運動的萌芽。……反對日本占領青島，反對日本在中國扶植特殊勢力，並且反對日本占領朝鮮。……要想中國人不反對日本，除非是日本「德謨克拉西」的改造運動成了功，方才做得到。因為中國人所反對的，是「武力的經濟的侵略主義」，並不是日本人。⁴¹

³⁹ 隻眼（陳獨秀），〈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每週評論》，第 21 號，1919 年 5 月 11 日，收於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 2 卷，頁 97。《每週評論》十分關注五四運動，於 5 月 18 日第一版公告：「本號有『對於北京學生運動的輿論』的特別附錄不另取資特此奉告」，《每週評論》，北京，第 22 號，1919 年 5 月 18 日，版 1。

⁴⁰ 隻眼（陳獨秀），〈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週評論》，第 23 號，1919 年 5 月 26 日，收於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 2 卷，頁 106-107。

⁴¹ TO，〈日本的『黎明會』和『新人會』〉，《星期評論》，第 2 期（上海），1919 年 6 月 15 日，3、4 版。

然而引介黎明會的李大釗在 1919 年 7 月 13 日，發表〈忠告黎明會〉與〈黑暗與光明〉，道：「日本的黎明運動，總算是一現曙光的影子。……但是看了福田博士的議論，彷彿他還在迷信侵略主義，簡直找不出半點光明來，很令人失望。」⁴²、「在日本的黎明會裡，也可以分黑暗與光明兩個層級。大概已經在社會上享有相當地位聲望的一流人的思想，比較不徹底……還是新人會一派的青年，較有朝氣。」⁴³李大釗發表的言論，是因為福田德三對山東問題的言論。一篇文章提及福田言論的內容，並呈現此事發生後，於中日民間親善顯現的問題，是如何對待內部分歧的「善」的一方：

有一篇法學博士福田德三關於山東問題的話，有一節說，……日本要維持獨立國的地位，必須撤回前次宣言，不再將山東交還支那，應宣布將該地永遠歸日本所有，為這事情，就使引起戰爭，也所不辭……。

我以為只要他們自翦其軍閥，思想能徹底解放，主張又能中正和平，那時兩國便不生惡感。總之目前黎明會的人，（指黎明會的福田德三）思想還沒完全解放，我們不能完全同他表同情，但是他們總算在日本是一種善的勢力……我們不妨對他表相對的同情，希望他們自覺自改。⁴⁴

雖對黎明會失望，但仍對新人會保有好感的觀點，也出現在周作人〈游日本雜感〉中，他認為自己所見的日本在無法違抗的時代精神下，正在改變明治維新對日本留下的害處，「除了黎明會福田博士的日本主義之外，也頗

⁴² 守常（李大釗），〈忠告黎明會〉，《每週評論》，第 30 號，1919 年 7 月 13 日，收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 3 卷，頁 361。

⁴³ 守常（李大釗），〈黑暗與光明〉，《每週評論》，第 30 號，1919 年 7 月 13 日，收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 3 卷，頁 362。

⁴⁴ 澹廬（俞頌華），〈對於福田德三之疑問〉，《時事新報》（上海），1919 年 7 月 5 日，3 版。

有不再固執國家主義的人；大學生的新人會，尤有新進銳氣。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國希望更大」但是相比日本因長久的德國式帝國主義教育產生的阻礙，他認為中國除了歷史因素，沒有其他障礙，可以更徹底的改革。⁴⁵

1919年8月，《每週評論》刊載高一涵理解的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動機是部分官僚看到有人介紹一點新思想，就說他們是「過激派」，於是只好談談無關政治的農村，他認為新村是反對生存競爭，想打造的是平等互助的社會，新村裡的人們同時是勞動者也是管理者，所以沒有階級，都是平等的「人」，而且這樣的想法同樣適用於國與國的關係，高一涵在文章中引述了數段武者小路的話，出自周作人的翻譯，其中一段為：

我們想造一個社會，在這中間，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損便是我的損……現今世上，都以為別人損失便是自己的利益，外國的損失便是本國的利益。我們對於這宗思想錯誤，想拿我們的實生活來證明他。⁴⁶

1919年12月，周作人寫信將翻譯《一個青年的夢》的消息告訴武者小路，武者小路的回信接著刊登在《新青年》上，他認為「支那是一個謎」，日本正在覺醒，但中國卻還沒，他希望他的著作可以幫助人們覺醒；武者小路的通訊後方附錄了幾個附記，蔡元培道：

武者先生與他的新村同志，都抱了人道主義，……別種新思潮的團體，如黎明會新人會等等，我們也信他絕不贊成侵略主義的。不但這一類的人，就是現在盲從了它們政府，贊成侵略主義的人，也一定有覺悟的一日。

⁴⁵ 周作人，〈游日本雜感〉，《新青年》，卷6號6(上海，1919年11月)，頁606。

⁴⁶ 涵廬（高一涵），〈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每週評論》（北京），1919年8月24日，2、3版。

陳獨秀道：「一般的日本人大半迷信『國家主義』，……像武者先生……那樣見解徹底的人，恐怕還是很少，這是我們很憂慮的事。……我希望現在的青年，對於武者先生底教訓不再像從前那樣冷淡！」⁴⁷

陳獨秀對武者小路實篤通訊的附記，註記日期是 1919 年 12 月 31 日，在 1920 年 1 月 1 日《新青年》隨感錄上，他表明「愛國」的危險：

中國古代的學者和現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觀念，不懂得什麼國家不國家……開口一個國家，閉口一個愛國；這種淺薄的自私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乃是一班日本留學生販來底劣貨……這種騙術傳到日本，日本用他騙了許多人（日本底平民和朝鮮人、中國人都包含在內）……其實大戰以後，歐洲底明白人已經有了覺悟……

最後，他重申了反日的立場，不是出於愛國心，而是更高一層的公共心，並要學生也有相同的「覺悟」：

我以為應該根據人道主義、愛公理主義，合全人類講公理不講強權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內），來撲滅那一切講強權不講公理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內），……拿日人來排斥日貨，在人類進化史上仍是黑暗的運動，不是光明的運動，我們學生界應當有深一層的覺悟，應當發展在愛國心以上底公共心。⁴⁸

⁴⁷ 武者小路實篤，〈與支那未知友人〉，《新青年》，卷 7 號 3（上海，1920 年 2 月），頁 47-48；蔡元培、陳獨秀附記，頁 50-52。陳獨秀的附記註記日期屬當中最晚，為 1919 年 12 月 31 日。

⁴⁸ 獨秀（陳獨秀），〈學生界應該排斥底日貨〉，《新青年》，卷 7 號 2，1920 年 1 月 1 日，收於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 2 卷，頁 163-164。

四、 結論

歐戰進行期間，帝國主義與人道主義相抗的觀點被用來理解歐戰於西方文明的意義，《新青年》群體的知識份子也注意到世界共同體的概念，認為這是出自戰爭下，國家與國家競爭，與國家命運共同的個人自由終有界限的認知，中國要跟上這股潮流，加入世界共同體且對人類有所貢獻，必須先打破不能與新思想並存的舊思想，其中以軍閥為代表。但另一方面，若認為加入歐戰有利中國，也意味著必須接受當時代表國家的軍閥政府。

歐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被視為新世界秩序的內容，知識份子期待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能藉著新秩序一改過往低落的國際地位，認為歐戰結果是公理戰勝強權，光明戰勝黑暗，人民戰勝軍國主義。國際上十四點原則與協約國是戰勝的光明方，代表世界和平的開始，而中國從歐戰得到的教訓，就是要消滅國內代表黑暗的軍閥，因為軍閥就是造成國際紛擾，使國內人民受到侵害的源頭。

對歐戰的看法以及十四點原則的理想，影響中國知識份子看待日本的方式。1919年2月，雖然認知到原本寄予厚望的十四點原則在巴黎和會中已經幻滅，知識份子還是以相同的架構理解並期許中日兩國的關係。日本對他們而言是特別的，因為同為東洋民族，要迎來東洋的光明，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基於這樣的信念，在日本國內推動民本的吉野作造與同樣認同威爾遜主義的李大釗開始了中日民間交流，以實現威爾遜主義。李大釗在期待中日民間親善的同時，也強調中日雙方應對等的一起參與世界，反對軍國的、侵略的大亞細亞主義。在1919年5月4日以前，《新青年》與《每週評論》裡呈現的是對日本人民的友好態度，並影響輿論對黎明會與新人會的印象。

1919年5月4日以後，中國知識分子依舊抱有區分政府與人民立場的想

法，且不只對於中國國內，也同樣適用於日本。表明支持反日的陳獨秀，也一再說明他反對的是導致山東問題失敗的中日兩國政府，即反對軍閥，並要求人民也有同樣的認知。然而，1919年7月，黎明會內部早已存在的分歧浮出檯面，福田德三的日本本位想法在山東問題下使他更傾向日本利益，中國知識份子在認知到這樣的事實後，將希望放到受黎明會影響而由學生組成的新人會上，不過，在失望之餘仍然對黎明會保有同情，認為僅是尚未「覺悟」。在被認為較無關政治的武者小路實篤身上，仍可看到中國知識份子以「光明與黑暗」理解武者小路的思想，可以說，中國新派知識份子的看法是一貫的，認為武者小路是人道主義的一方，新村裡平等的個人關係，和他們希望日本對待中國、世界對待中國的方式是一樣的，而武者小路《一個青年的夢》代表的是人民的「覺悟」，這正是新派知識份子不斷呼籲的。

有留日經驗的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受到歐戰的影響，認為國際上，中日兩國要順應潮流加入世界，不過因同為亞洲的一份子，命運更緊密，而對日本國內，他們將日本人民與日本政府區分，希望日本人民如歐戰裡民主對抗軍國一樣，起而排除代表侵略、強權的帝國主義毒素，一如他們希望中國人民對抗軍閥。

從收集到的文獻來看，則可以發現有留日背景的三人較有接收日本消息的管道，如李大釗與吉野作造的人際網絡、陳獨秀對留日學生流行觀點的了解，以及周作人與武者小路實篤的交流，可見他們一定程度關注日本國內消息，以及延伸而來的中日兩國相互影響。

此外，關心集體層次的陳獨秀、李大釗，他們之所以對初期的黎明會或武者小路的思想表示認同，從兩人呼籲「覺醒」的最大單位不侷限在一國，而是放眼世界來看，除了威爾遜主義風潮的緣故，可能也與中國傳統的天下觀有關。陳獨秀強調愛國、國家主義是狹隘的，以及李大釗反對以日本為中

心的大亞細亞主義，提出亞洲各國平等聯合後，再與歐美組成聯邦，他們接受國家的存在，認為國家是參與世界秩序的工具，但有超越以國家為利益單位的理想，非僅希望避免戰事，既與無政府主義不同，也與西方秩序的國與國間是獨立而互相傾軋，所以需要國際聯盟抑制，最終以保障各國利益為目標的世界觀不同。可見威爾遜主義風潮僅是讓他們更確信自己的信念，使用其中語彙，並非代表威爾遜主義是內容的全部，因此威爾遜主義雖作為黎明會與他們相聯繫的語言，實際上存在認知差異，該差異後導致陳李兩人對黎明會感到失望。關此，也許從兩人早於 1918 年的文獻進一步探究，可以得到更多論證。

總結而言，《新青年》與《每週評論》呈現的對日觀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環，並受到威爾遜主義的影響。對輿論產生巨大影響的五四運動，沒有動搖他們認為人道主義是普世的思想基礎，依舊堅守人民與政府的善惡區分，使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與人道主義的普世性沒有衝突。縱使認識到國際現實上威爾遜主義的破滅，以及山東問題顯現出的「善」的一方存在認知分歧，新派知識份子仍深信打破舊思想，沒有了軍閥，人民有了覺悟，中國就可以跟上世界，中日兩國有了民主，沒有了軍國主義，就可以和平相處、共存共榮，因此，他們仍然對日本人民保有希望。

五、徵引文獻

（一）專書

1.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石曉軍，《中日兩國互相認識的變遷》，臺北：臺灣商務，1992。
3. 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臺北：東華書局，1977。

（二）論文

1. 丘為君，〈「新文化運動」時期（1915-1925）的人道主義〉，《師大學報》，66:1(臺北，2021)，頁1-35。
2. 丘為君，〈「歐戰」與中國的現代性〉，《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6:1(臺北，2008)，頁75-123。
3. 周志煌，〈「我」與「非我」的對話——周作人文化思想中的民族想像與世界圖像〉，《民間文學年刊》，1(花蓮，2007)，頁21-44。
4. 張玉法，〈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與言論，1915-192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臺北，1994)，頁285-329。
5. 張忠棟，〈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臺北，1985)，頁291-325。

6. 陳俊啟，〈周作人的文學思想（1902-1923）——兼論其與五四新文學運動之關係〉，《成大中文學報》，67(臺南，2019)，頁143-184。
7. 陳翠蓮，〈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師大臺灣史學報》，6(臺北，2013.12)，頁53-100。
8. 黃玉順，〈「國權」與「人權」之紐結——「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辨正〉，《鵝湖月刊》，536(新北，2020)，頁3-13。
9. 黃自進，〈吉野作造在五四時期的對華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臺北，1993），頁505-529。
10. 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收於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輯：五四運動》，（臺北，1990），頁481-504。

（三）學位論文

1. 應俊豪，〈公眾輿論與北洋外交——以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為中心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四) 雜誌報紙

1. 《新青年》

- 1)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新青年》，卷 5 號 5(北京，1918 年 11 月)，頁 436。
- 2)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卷 6 號 3(北京，1919 年 3 月)，頁 266-268、274。
- 3) 周作人，〈游日本雜感〉，《新青年》，卷 6 號 6(上海，1919 年 11 月)，頁 606。
- 4) 周作人，〈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新青年》，卷 4 號 5(北京，1918 年 5 月)，頁 425-429。
- 5) 武者小路實篤，〈與支那未知友人〉，《新青年》，卷 7 號 3(上海，1920 年 2 月)，頁 47-48。
- 6)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新青年》，卷 4 號 1(北京，1918 年 1 月)，頁 1-4。
- 7) 陶履恭，〈歐戰以後的政治〉，《新青年》，卷 5 號 5(北京，1918 年 11 月)，頁 439-441。
- 8) 蔡元培，〈勞工神聖！〉，《新青年》，卷 5 號 5(北京，1918 年 11 月)，頁 438-439。
- 9) 蔡元培，〈蔡子民先生之歐戰觀〉，《新青年》，卷 2 號 5(北京，1917 年 1 月)，頁 6。

2. 其他報刊

- 1) 〈日本思想界之新潮流〉，《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2月5日，3版。
- 2) 〈青島問題已提出〉，《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2月5日，2版。
- 3) 〈青島問題已提出和會〉，《民國日報》（上海），1919年2月4日，1版。
- 4) 〈蔡元培辭職之原呈〉，《神州日報》（上海），1919年5月19日，3版。
- 5) TO，〈日本的『黎明會』和『新人會』〉，《星期評論》，第2期（上海），1919年6月15日，3、4版。
- 6) 吉野博士，〈黎明會〉，《每週評論》（北京），1919年1月19日，4版。
- 7) 涵廬（高一涵），〈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每週評論》（北京），1919年8月24日，2、3版。
- 8) 涵廬（高一涵），〈關於膠州和約的修正意見〉，《每週評論》（北京），1919年6月1日，2版。
- 9) 澹廬（俞頌華），〈對於福田德三之疑問〉，《時事新報》（上海），1919年7月5日，3版。

Chinese intellectuals view of Japan in *New Youth Magazine* and *The Weekly Review* in the May Fourth era

You-ai Lin

Senior Class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d *New Youth Magazine* and *The Weekly Review* from 1917 to 1920 as main research materials, observing the *New Youth Magazine* group's worldview to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y considered.

From 1918 to 1919, China and Japan were both influenced by the world order after First World War.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the intellectuals' worldview first. during First World War, the point of view that Humanitarianism against Imperialism, has already existed. They also noticed the concept of world community. Because of the victory of the Allies and the Fourteen Points, they were more convinced of the dichotomy of the warlord government and people. By observing the exchange started by Yoshino Sakuzo and Li Ta-chao, the response to the Saneatsu Mushanokoji's idea introduced by Zhou Zuoren, can find the intellectuals have a friendly attitude to the Japanese national, even w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roke out. Chinese intellectuals view of Japan in *New Youth Magazine* and *The Weekly*

Review, is par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intellectuals appeal to people to awaken, believing democracy can bring pea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irst World War, May Fourth Movement, *New Youth Magazine*, *The Weekly Review*